

# 郭士立牧師創立之福漢會及對 太平天國之影響

李志剛

## 一、引言

近代學者論及太平天國之革命，有謂民族革命；有謂政治革命；有謂社會革命；更有謂宗教革命。然而太平天國運動，牽涉社會、政治、軍事、經濟、曆法等各種層面的變革，影響中國文化固然重大，但對於晚清之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辛亥革命運動均產生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因此太平天國可謂近代中國歷史重要環節，其發展及地位實具肯定性的價值。

洪秀全自一八五一年在金田村起義，正號「太平天國」。「太平天國」之稱號，「天國」一詞，實源於基督教教義，含有神學的內涵，可見太平天國之建立，與基督教在華傳播有密切的關係。就以太平天國採用的經典、詩歌、禮儀、制度；以及洪秀全和洪仁玕的意識形態，均有基督教的色彩與成份。追源探本，太平天國創始人洪秀全，於一八三六年往廣州應試不中，繼而獲得梁發所編的「勸世良言」；一八四三年最後一次赴廣州應試又落榜，六月在花縣創立「拜上帝會」；一八四七年三月與洪仁玕到廣州訪羅孝全牧師（Rev. Issachar Jacob Roberts），學道不果再往廣西。是以足見洪秀全早年活動，多屬宗教性的活動。惟是從洪秀全宗教活動所見，由於一八三六年接受「勸世良言」，因而引發一八四三年病中的夢幻，及後創立拜上帝會。但當一八四七年春洪秀全與洪仁玕之往廣州學道，其時梁發在廣州傳道，依理而言，應訪梁發較為合理。但洪秀全所要接觸的不是梁發而是羅孝全牧師，這實因福漢會會員周道行引介之故。太平天國起義後，所用聖經的版本，刻有「福漢會」的字樣，其中多是郭士立牧師（Rev.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的譯本。甚或太平天國崇拜的禮儀，亦非羅孝全牧師所服務浸信會的模式。在各種問題推論下，澳洲學者克拉克（Prescott Clarke）在「上帝來到廣西」（The Coming of God to Kwangsi）一文，指出郭士立牧師所創辦的福漢會，與太平天國運動有密切的關係。但為研究太平天國史學者所忽視，實有加深研究和探討之必要。

## 二、郭士立創立福漢會及其發展

「福漢會」(The Chinese Union,

Der Chinesische Verein) 於一八四四年二月十四日創立，會名意指「欲漢人信道得福」，目的是使華人在中國對國人傳揚福音。其時中國雖然開放五口通商，但在條約上並無傳教的寬限，外國人進入內地傳教仍屬禁例，因此郭氏認為福音的傳播有賴華人的努力，外國教士祇宜從事教導工作。福漢會創辦之時有會員廿一人，除郭士立牧師、羅孝全牧師外，其餘全屬華人，郭氏為書記，但掌握實權。福漢會並非傳統式的一所教堂，而是一個信徒訓練中心，會員的生活和會員的集結與莫拉維弟兄會(The Moravian Brethren) 模式相近，所採用方法是教導與實踐並行。訓練傳道員程序如下：

第一階段：教授基本教理，考試及格後遣往鄰近鄉鎮派發宗教單張書刊，作個人佈道工作。

第二階段：完成第一階段行程後，即需返回訓練中心，繼而教授較深課程，然後遣較遠地區傳道。

第三階段：完成第二階段行程後，即需回到中心接受深度教理的訓練，經考試及格，則指派較遠特定的地區傳教。以後傳道人按時出外工作，並按時返回中心報告。

福漢會華人會員逐年增加，一八四四年會員廿人；一八四五年八十人；一八四六年一百七十九人；一八四七年三百人；其中有五十名

傳道員；一八四八年一千一百人，其中有一百名傳道員；一八五〇年一千八百七十一人，其中約有二百名傳道員。福漢會會員逐年增加，會務發展迅速，傳道員經已到達廣州、佛山、順德、三水、韶州、南雄、潮州等地設立分站，而傳道員更有遠至海南島、廣西、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等地傳教。

福漢會會務擴展快速，郭氏難以照應，所以先後多次去信德國巴勉傳道會(The Barman Missionary Society)，巴色傳道會(The Basel Missionary Society)，巴陵傳道會(The Barlin Missionary Society)，請求遣派教士來華，協助福漢會工作。一八四六年巴勉傳道會即有柯士德牧師(Rev. Heinrich Küster)，葉納約牧師(Rev. Ferdinand Ganahr)，巴色傳道會有韓山明牧師(Rev. Theodore Hamberg)，黎力基牧師(Rev. Rudolph Lechler)，應徵東來，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九日到達香港。一八五一年巴陵傳道會即有那文牧師(Rev. Robert Neumann) 來港，亦隨郭氏學習華語接受指派工作。

郭氏對於華人傳道員向是信任包容，其中有不少吸食鴉片及行為惡劣的會員，在領取傳教刊物之後，並無到指定工作地點派發傳教，及至預定時間即返訓練中心作出虛假報告，以便領取薪金，是以引起不少西教士之不滿，而其在倫敦傳道會的理雅各牧師(Rev. James

Legge) 攻擊最為激烈。郭氏為使歐洲各傳道會及支持者釋疑，是以在一八四九年十月一日請假返回歐洲。在旅途中，郭夫人不幸在馬六甲病逝。郭氏十一月廿四日抵英國，旋獲英國坎特伯里大主教(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普魯士駐英大使、倫敦主教、國會議員熱烈接見歡迎。郭氏返抵德國不久，即往法國、荷蘭、波蘭、蘇聯、芬蘭、瑞典、丹麥、奧地利、比利時、瑞士等地遊行演說，藉以宣傳福漢會工作，期望各傳道給予支持，其時更在歐洲各地組織中國傳道會(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鼓勵各教會青年獻身前來中國宣教。一八五〇年十一月抵倫敦不久，其後與中國婦女協會(The Women's A Society for China) 熱心會員姬百利小姐(Miss Dorothy Gabriel) 結婚，隨即啟程回港。

郭氏回國之前已將福漢會事務交韓山明牧師處理，由於韓山明牧師不贊成郭氏之方法，及郭氏所濫收之會員，遂聯合其時在港之西教士對郭氏加以攻擊，故有脫離福漢會而歸傳道會工作之意。及至郭氏於一八五一年三月廿八日返抵香港，郭氏之福漢會即遭分裂，力量更顯薄弱，惟是隨郭氏來港之那文牧師，有見郭氏真心傳教，亦無違法之事，其後亦在福漢會工作，助郭氏發展會務。不幸郭氏因患痛風症於八月九日病逝，有謂工作過勞所致，享年四十八歲，後葬香港跑馬地政府墳場。生前港府嘗於中環街道，定一街名為吉士笠街(Gutz-

latif Street) 作為褒揚。福漢會工作則由那文牧師接理，及至那文牧師於一八五五年離港，福漢會因而停辦。

福漢會可謂其時中國最龐大之宣教組織。至於華人提述福漢會之歷史，實以福漢會會員曾在郭氏門下受教之王元深所寫之「聖道東來考」最為可靠。該書在「福漢會入粵記」有載：

日耳曼之普魯士，有名郭士立者，於一千八百廿七年（道光七年）為荷蘭教會所遣，入中國傳道。先至葛羅巴島，該地為荷蘭屬埠，閩粵人貿易於此甚衆。郭君於此島操閩語，習華文。一千八百廿九年（道光九年），郭君附商船入中國。初抵天津，繼至福州，沿岸派送小書。既而至粵，寓澳門，學粵語，譯聖經，以為傳道之預備。其時海禁未開，不敢入內地。一千八百卅八年（道光十八年）林文忠公來粵，禁除鴉片，致中英失和。時英人鮮通華文，惟郭士立能之，故英官延郭君為繙譯。道光十八年冬，英人連次攻陷虎門六處砲臺，三江協陳聯升父子陣亡於沙角，虎門提督關天培陣亡於鎮遠。英人又攻陷省河獵德與東砲臺。十九年攻南京，據守運糧河口，中政府遣奕親王議和。一千八百四十一年（道光廿一年）和議成，香港小島，遂為英人租界，并償兵費六百萬兩，又准五口通商，即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處。斯時洋人僅居五港口岸

而已，不許入內地。道光廿一年冬，英人在香港島北，群帶路地面，始行闢地，離香港灣十餘里。內地洋務事，仍未開禁，凡至群帶路者，謂之通番，拘之受罰，時人畏之。凡來群帶路者，皆詭言往長洲香港。日久成習，遂名群帶路為香港。道光廿二年，漸建兵房、衙署及樓所。郭士立教士居香港，為英人繙譯官，兼招人學耶穌道。日間辦理公事，朝晚教授耶穌道理。其初學道者，不滿十人，漸招漸衆，皆自備資斧而來。稍明達者，郭君即遣之入內地傳道，派送耶穌聖經，為將來教士入內地傳道之先路。郭君立教會時，名其會曰福漢會，意欲漢人信道得福也。因游其門學道者日衆，繙譯事繁，不能專一傳道，乃修函祖國巴色禮賢二會，謂華人求道甚殷，求遣人前來，相助為理。時巴色會則遣韓山明、黎力基二人。禮賢會又名巴勉會，則遣柯士德、葉納清二人。四位教士同船來華，於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道光廿七年）二月抵香港，助郭君傳道，皆改易華服。是年六月，羅琛源、王元深、劉展聰、黃德風等，游於郭門學道，同時領洗。道光廿七年十一月，郭君遣王元深、李清標、偕葉納清入內地，往東莞、虎門傳道，寓於鎮口客店，先以施醫開路，地方官查，知為施醫，無甚禁阻。葉納清居數月回香港，與黎力基牧師再至鎮口，乃立館傳道，此是西教士入內地立館之始。

郭君又遣蔡福偕柯士德教士，往新會江門傳道，為地方官所阻，遂回香港。柯君旋染痢疾，卒於香港。郭君又遣潮人亞愛偕黎力基教士往汕頭傳道。又遣徐道生偕韓山明教士往新安入鄉傳道。此數位教士，皆在洲島邊隅之地傳道，海禁未開，不敢入內地。時游郭門學道日衆，領洗者約有一百餘人。其間良莠不齊，扶同作弊者有之。郭君不暇察覺，葉黎韓三人知其弊，與郭君意向不同，因此而分，各歸本會自理。

郭君於道光廿六年回國，著論演說，備述華人求道者衆。翌年小巴陵傳道會，始遣那文教士來華，僑寓灣仔山上。至咸豐元年，郭君復來香港，與那文同事。是年郭君邁疾，卒於香港。福漢會傳教事，乃歸於小巴陵那文統理，又兼招生徒學道，時有何槐卿、區道成、梁楊等學道。又有屈安、吳旭添等助理傳教。郭君未逝時，英官在中環立一街，名曰郭士立街，以誌景仰云。

在王元深所撰福漢會一文，得知早期到港之三巴傳道會教士，實以協助郭牧師工作，應屬福漢會之會員。而各教士之抵港均由郭氏教導語文，葉納清、柯士德則教廣府語；韓山明則教客家語；黎力基則教潮州語，在學語期間更由郭氏遣派工作，是以形成各教士傳教地區。王元深在「聖道東來考」一書，在各會入粵之次序上，「德國禮賢傳道會入粵記」；「德

國巴色傳道會入粵考」；「德國小巴陵傳道會入粵考」，均列於「福漢會史」之後，可見三巴傳道會是由福漢會演化而來。有謂：「其間良莠不齊，扶同作弊者有之。郭君不暇察覺，葉黎韓三人知其弊，與郭君意向不同，因此而分，各歸本會自理。」在此推知葉納清、黎力基、韓山明三人之歸本會自理，意即脫離福漢會，而直接原屬傳道會負責，在時間上應屬一八五一年之事。又謂：「至咸豐元年，郭君遭疾，卒於香港。福漢會傳教事，乃歸於小巴陵那文統理。」在「德國小巴陵傳道會入粵考」一文亦載：

一千八百五十年（即道光卅年），小巴陵傳道會始遣那文牧師來華，寓香港灣仔山上，學習粵語，逮郭士立自故國復來香港，遂與耦而傳道，郭君逝後，福漢會乃歸於小巴陵會那文牧師兼理。斯時那牧師招人學道，有何槐卿、區道成、梁揚等從學。又有曾從郭君學道吳旭添、屈安等，兼任學課。咸豐三年，那文牧師特僱一小舟，週遊海濱之村鄉傳道。一日至瓊州府海口，登岸講道，為地方官所阻。（因海禁未開也）行踪遂回，此為西人到瓊州傳耶穌之始。咸豐五年，小巴陵會又遣韓士伯牧師、郭念三醫，同來中土。寓香港灣仔山上，助那文牧師傳道。那文牧師因其師奶染病回國。

由此得見那文牧師實郭士立牧師的承繼者，至其返國後，福漢會才告結束。

### 三、福漢會與太平天國領袖之接觸

洪秀全和洪仁玕可謂太平天國重心的人物，二人接觸基督教士實始於一八四七年春到廣州與羅孝全牧師之會面。王元深在「聖道東來考」論「浸禮會入粵記」有載：

翌年羅教士回國，數年後，復來羊城東石角傳道。花縣人洪秀全，涉獵書史，來省應試，偶得耶穌小書數本，週覽後，始悟偶像菩薩之謬，不應奉拜，乃往東石角禮拜堂聽講福音，交識傳道者周道行，供給其學道。閱三月，求羅教士與施浸禮，又求借銀五員，羅見其有異志，故却之，謂其道味尚淺，須再研究。秀全以所求不遂，離羊城回家，一去無復回，道行所供秀全三月之需，亦無歸款，此是周道行自述之言。

洪秀全與洪仁玕所以認識羅孝全，實因周道行之引介。羅孝全其時為福漢會在廣州之主持，周道行更是福漢會傳道員。由於此次接觸，以致日後洪秀全邀請羅孝全進京出任「洋務丞相」實有密切關係。

至於郭士立與洪秀全之接觸，似無史實可考。惟是馬克斯於一八五〇年一月在萊茵報發表之「國際述評」，內中有謂：

最後，再談一談有名的德國傳教士居茨拉夫（按即郭士立）從中國回來后宣傳的一件值得注意的新奇事情。在這個國家

，緩慢地但不斷地增加的過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會條件成爲這個民族的大多數人的沉重枷鎖。後來英國人來了，用武力達到了五口通商的目的。成千上萬的英美船隻開到了中國，這個國家很快就爲不列顛和美國廉價工業品所充斥。以手工勞動爲基礎的中國工業經不住機器的競爭。牢固的中華帝國遭受了社會危機。税金不能入庫，國家瀕於破產，大批居民赤貧如洗，這些居民開始憤懣激怒，進行反抗，毆打和殺死清朝的官吏與和尚。這個國家據說已經接近滅亡，甚至面臨暴力革命的威脅；但是更糟的是，在造反的平民當中有人指出了一部份人貧窮和另一部份人富有的現象，要求重新分配財產，過去和現在一直要求完全消滅私有制。當居茨拉夫先生離開廿年之後又回到文明人和歐洲人中間來的時候，他聽到人們在談論社會主義，於是問道：這是甚麼意思？別人向他解釋以後，他便驚叫起來：這麼說來，我豈不到那兒也躲不開這個害人的學說了嗎？這正是中國許多庶民近來所宣傳的那一套啊！

雖然中國的社會主義跟歐洲的社會主義像中國哲學跟黑格爾哲學一樣具有共同之點，但是，有一點仍然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鞏固的帝國八年來在英國資產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響之下，已經處於社會變革的前夕，而這次變革必將給這

個國家的文明帶來極其重要的結果。如果我們歐洲的反動份子不久的將來會逃奔亞洲，最後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那末他們說不定就會看見這樣的字樣：

RÉPUBLIQUE CHINOISE  
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

中華共和國

自由，平等，博愛

一八五〇年一月卅一日倫敦

馬克思所說中國的革命，顯然是指「太平天國的革命」，這是西方發表太平天國革命最早的消息，然而馬克思的資料完全來自郭士立牧師在英國的報告。換言之，郭士立牧師對洪秀全的革命計劃早有知悉，否則不會肯定太平天國起義的成功。據知郭士立牧師到歐洲組織「中國傳教會」(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以作對福漢會的支援，故在歐洲推行中國三分區計劃，並獲致支持者有：

1. 安徽省—丹麥與挪威聯合支持
2. 浙江省—英國
3. 直隸省(河北)—德國萊比錫城(Leipzig)
4. 福建省—英國
5. 河南省—德國萊茵省(即禮賢省, Rheinland)
6. 湖南省—德國巴伐利亞省(Bavaria)

7. 湖北省—德國盧比克城、墨蘭堡城、德勒斯登城(Lubeck, Mecklenburg, Dresden)

8. 甘肅省—德國克隆瑪城(Krumma)

9. 江西省—法國

10. 江蘇省—德國漢堡(Hamberg)

11. 廣西省—瑞典

12. 廣東省—德國卡式城(Cassel)

13. 貴州省—德國但澤城(今屬波蘭, Danzig)

14. 山西省—德國斯德丁城(今屬波蘭, Stettin)

15. 山東省—英國

16. 陝西省—德國克隆瑪城(Krumma)

17. 四川省—德國柏林城(Berlin)

18. 雲南省—東普魯士(East Prussia)

19. 滿州—德國赫斯城(Hesse)

20. 蒙古—德國莫拉維弟兄會(Moravian Brethren)

21. 西藏—德國克隆瑪城(Krumma)

22. 新疆—

23. 青海—

郭氏此項計劃是否為配合太平天國革命而推行之一項宣教計劃，雖然不能確定，然而福漢會員參加太平天國運動實屬事實，衛三畏教士在一八五三年三月廿六日在信上提及郭士立的人在太平軍中具有影響力。

一八五一年洪秀全在金田起義，洪仁玕因未能與太平軍會合，致被清兵緝捕，其後逃往

東莞李朝，為族人洪新帶往香港投靠韓山明。

不久韓山明牧師因有到新安布吉傳教之事，洪仁玕在港生活無依，遂潛回東莞牛眠埔在友人張彩庭處匿居，任職私塾餬口。一八五三年韓牧師染病回港，洪仁玕再來投靠，並從韓氏學道，於十一月在港領洗，隨後在教會教授西士華文華語，其間助韓山明撰寫「太平天國首義記」(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一八五四年春，洪仁玕擬由上海入南京效力洪秀全，韓山明資助二百元於五月十日乘船北上，行前贈予三本聖經、巴特氏之聖經歷史、葉納清之聖會大學、世界地圖、中國地圖、巴勒斯坦地圖、釘孔機、銅模機、字帶、望遠鏡、圓規、寒暑表、小刀等物。惟是二人分手後九日，韓山明因患病疾逝世。韓山明於一八五四年發表之「太平天國首義記」，事屬太平天國史最早之文獻。韓山明來華傳教先後計有七年之久，在福漢會任事四年，主理福漢會亦有一年半之時間，則或其後三年(一八五一至一八五四年)，多在福漢會原有地區去發展巴色傳道會之事務，其之能稱為中國客族傳教開山祖，實有賴郭士立之指導方有其後之發展。

洪仁玕可謂太平天國後期之中興名臣，其在一八五九年撰寫的「資政新編」，實為推行政治、經濟、外交、社會的改革方案。然而洪仁玕的改革理論是從西教士學習，內文提及「相善」之外人有：「紅毛邦」、「花旗邦」、



「日耳曼邦」、「瑞邦」等廿二人，而廿一人均為基督教之牧師，葉納清、黎力基、羅孝全、韓山明等四人是福漢會會員，足以佐證洪仁玕與福漢會有密切的關係。

對於太平天國革命事業，早期在華教士本寄予極大期望，藉太平天國使中國成為基督化的國度。先後抵天京訪問或與太平軍接觸計有：麥都思牧師、裨治文牧師（Rev. Elijah Coleman Bridgman）、戴醫生（Dr. Charles Taylor）、艾約瑟（Joseph Edkins）、楊篤信（Griffith John）、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高第丕（T. P. Crawford）、花蘭芷（J. L. Holmes）、赫威爾（J. B. Hartwell）、覺士（Rev. Josiah Cox）、羅存德（William Lobscheid，有譯盧威廉）等教士。羅孝全於一八六〇年十月十三日到達天京，洪秀全委為「洋務丞相」（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此種關係，皆有福漢會的淵源。羅存德原是德國巴勉傳道會教士，一八四七年到港，襄助郭士立牧師工作，自福漢會結束亦轉入倫敦會工作，其於一八六三年春訪問天京，是最後入京的教士，其報告於一八六三年六月十日在香港德臣西報登載，對太平天國均有好評。可見太平天國運動，由始至終均為福漢會教士所關懷。

#### 四、郭士立之意識形態與太平天國之關係

由於郭士立牧師是傳教士身份，因其依附

英國商業及政治勢力，從而參與鴉片煙商之販賣活動，參與中英鴉片戰爭期間之外交事務，在身份的複雜性，以及工作的多元性，往往受到中外學者之批評和非議。惟是中外史家甚少對郭士立的教育背景所產生的意識形態有深度的探究。郭氏自小生長比列茲鎮，本是信義宗教會（Lutheran Church，有稱為路德宗）敬虔派（Pietism）所屬地區。論及近代基督教虔敬主義之發生，是始於信義宗教會施本爾牧師（Rev. Philipp Jacob Spener 1635-1705），至夫蘭克（August Herman Franke）更是發展推廣。敬虔主義主張信徒生活應與宗教結合，鼓勵信徒研讀聖經，參加靈性訓練，彼此加強聯繫，以上帝的道為生活的中心，因此要努力傳揚福音，關懷他人靈魂的救贖。夫蘭克創辦哈勒大學（Halle University），成為敬虔派人士的大本營，歐洲教師、牧師、宣傳師多在此校出身，影響近代宣教運動甚鉅。敬虔主義本非一種組織，而是一種主張，強調重點不在乎教會聖禮，而在於特殊歸正的經驗。其後在敬虔主義思想影響下，即有莫拉維弟兄會的產生。親岑多夫伯爵（Nicholas Ludwig von Zinzendorf 1700-1760）在哈勒大學肄業後，旋在紇仁護特（Herrnhut）村莊，成立殖民同盟，教會稱之為「弟兄會」（Brethren）。此種小型教團相繼在荷蘭、丹麥、英國、北美各地設立，一七三二年開始派遣教士到印度傳教，其後更有大批教士投入國外傳教的行列。郭士立是於一

八二〇年入哈勒大學夫蘭克學院（Franke's Paragium）攻讀外交，其時深受哈勒敬虔思想之影響，是以入學不足兩月，於一八二一年一月十九日轉入柏林仁涅克傳教學院就讀。仁涅克傳教學院是教父（Father）仁涅克牧師（Rev. Johann Jänicke 1748-1827）所創，仁涅克牧師為柏林信義會主任，及普魯士中央聖經公會（The Prussian Central Bible Society）之創辦人，於一八〇〇年在柏林創辦仁涅克傳教學院，此學院為歐洲訓練傳教士最早之傳教學院，專為英國、荷蘭、德國教會訓練傳教士。仁涅克教父極為強調莫拉維弟兄會敬虔的精神。其口號是：「在不信的時代裏要忠心的去見證福音；在小信的時間裏唯獨是見證福音」[faithful witness of the Gospel in a faithless age, a solitary witness of Gospel in a times of little faith]仁涅克教父極為鼓勵學生到沒有基督教的國家去傳揚福音。

當郭士立牧師在仁涅克傳教學院接受訓練之時，近代神學之父（Father of Modern Theology）士來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 1768-1834），於一八一〇年籌創柏林大學，任神學院教授。士氏早年畢業哈勒大學，是敬虔派學者，認為基督教信仰不能祇限於用傳統的方法，用哲學的理論去解釋聖經，而忽略聖經所具有宗教經驗和宗教感情的價值。基督教信仰應有虔誠的感情，人對上帝有「絕對的依靠感」，人的存在

應與宗教結合，因此人生必須以耶穌基督為信仰的中心，士來馬赫之神學思想，影響神學界甚大。在十九世紀初葉，柏林大學亦為「浪漫主義」(Romanticism) 哲學思潮所充斥，士來馬赫與此派學人多有接觸，對其神學觀念定有影響。郭士立牧師在仁涅克傳教學院攻讀之時，亦嘗到柏林大學選讀哲學，故其思想背景自然含有「敬虔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意識形態。

以郭士立牧師在華一生事業所見，郭氏於一八二九年決然脫離荷蘭傳道會的關係，沒有經過任何的諮詢和任何機構的保證，是一般傳統的傳教士難以得見，其勇氣和決心實憑個人與上帝交往而感受到的經驗，與莫拉維弟兄會的精神是同出一轍。其後一生雖然在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政府任職，但總不離傳教的職志。郭氏在華期間不屬任何傳道會，更無創立任何傳統式的教會，即或其創辦的福漢會本屬一個教育訓練中心，無嚴謹的教條和禮制，祇鼓勵會員專心傳道。從福漢會之組織及工作了解，實與莫拉維弟兄會之模式無異。

有關太平天國之道德生活，香港維多利亞主教施美夫 (Rt. Rev. George Smith) 曾報導太平天國人民嚴守基督教十誡，禁止淫佚放縱事物，鏟除飲酒、吸煙、賭博、說謊、咒罵、吸食鴉片各種陋習，過著一種清教徒式的生活。簡又文在「清史洪秀全載記」有論：

拜上帝會之禮拜儀式，亦為洪、馮創製者。大堂一端神桌上置明燈二盞，清茶三

盃。男女分坐左右。開會唱讚頌歌，主任人講道。祈禱時，全體向陽光入室處跪下，由一人代眾禱告。凡皈依之新教徒，先跪誦懺悔狀，焚化之。主任人問悔改否？拜上帝否？守天條否？答語合格，乃取水一盃灌其頂上。新教徒立起，自飲清茶一盃，後以盃水自洗心胸，表示洗心革面之意。禮成。眾教徒又常到河中洗淨全身，同時祈禱認罪求赦。會眾各向總會領取洪、馮特製之祈禱文，謂之奏章，晨昏禮拜念誦。凡有吉凶大禮或特別事故，皆行祭告儀式，以食物作犧牲。祭畢，共食之。凡此皆擷探中國拜祭之最敬禮，施行於無師自創之新教中，亦中西合璧之儀式。初期之太平基督教之真象有如此者。

郭士立牧師既受莫拉維弟兄會之影響，而歐洲弟兄會崇拜地點多在室內舉行，陳設簡單，不設聖壇、十架、圖像及講台。聚會之時男女分坐禮堂兩旁，牧師祇在座位之前站立或坐近一桌子之前，崇拜儀式簡單，祇有唱詩，讀經與禱告。該組織並無法定教義標準及信仰條文，其理想社會在於建立友愛的團體。為使生活嚴謹，亦有總長、上級長老、長老、組長、班長之設立，藉以照顧全組紀律與靈修。所以太平天國的禮拜儀式和宗教人事制度與莫拉維弟兄會甚是相近。

### 五、郭士立聖經譯本與太平天國所採用聖經之關係

香港維多利亞主教施美夫牧師有謂洪秀全頒旨印製詔書之時，凡屬「天主」即擡頭一字；凡遇「新遺詔聖書」(按為新約聖經)、「舊遺詔聖書」(按為舊約聖經)即需抬頭三字，顯出聖經具有最高的權威性。哈喇 (Lin Le) 在「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Ti Ping Tien Kwoh, 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 記謂：

何木斯號訪問南京數月之後，法國戰船加西尼號也訪問了南京，帶回「創世紀」、「出埃及記」的重印本和一部份「新約」，包括根據郭士立博士譯本複印的「馬太福音」。

郭士立牧師是一位富有才華的作家，寫有中文、日文、暹文、德文、荷文、英文之著作幾十種。自馬禮遜牧師於一八三四年逝世後，麥都思牧師、裨治文牧師、郭士立牧師、馬儒翰著手進行修訂馬氏譯本工作，一八三七年在巴達維亞出版「新約」，稱為「新遺詔聖書」，以麥都思牧師為主力；一八四〇年出版「舊約」，稱為「舊遺詔聖書」，以郭士立牧師為主力。其後郭士立牧師再將新約加以修訂，稱之為「救世主耶穌新遺詔聖書」，而此修訂本亦為其後太平天國採用之譯本。

洪秀全定都南京將聖經印發，其中採郭氏譯本為法定版本，每冊封面印有太平天國國徽，及太平天國之年曆。洪秀全曾以郭氏譯本之「創世紀」、「出埃及記」、「馬太福音」作為應試員生之參考本。一八五三年有英國海軍

上校費士班 (E. G. Fishbourne) 曾到南京訪問，有見太平軍散佈聖經極廣，有四百人終日從事聖經印刷，不斷派發聖經。太平天國採用郭氏譯本，實因與福漢會之關係而致，在上海徐家匯天主堂存有「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譯本，有「郭士立譯并耶穌降生一千八百五十四年福漢會」等字。由於太平天國之重視聖經，楊格非牧師曾向倫敦傳道會報告：

我深信上帝現在正在藉著作亂者之手鏟除此地之偶像，並且由於他們與外國傳教士的關係，會把基督教裁種上去。

英國有雅各約翰牧師 (Rev. John Angel James) 撰文呼籲為太平天國印刷一百萬本新約聖經，而英國聖經公會亦概允此項要求。郭氏譯本為太平天國旨准頒行之官書，不祇有其

歷史文獻上的價值，並反映太平天國與福漢會深厚的關係。

## 六、結 論

郭士立牧師以德籍教士身份，而能憑其才華棲身於西方殖民事業之中，實有其非凡之處。然而其多元性的事業，不論獻身傳道，任職官員，語文教習，聖經繙譯，著書立說，俱有卓絕的貢獻和成就，亦被視為近世重要的漢學家。郭氏對於中西文化交流之貢獻，以及對基督教的傳播均有不可磨滅的功績。正因郭士立牧師是一位莫拉維弟兄會的敬虔者，充滿「敬虔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意識形態，故常受到保守和傳統的教士所攻擊，但是與郭士立牧師同時代的美國衛三畏教士則對之備極推崇。

郭士立牧師可說是「弟兄會」在中國傳教第一位的教士，其創立的福漢會亦是郭氏獻身傳教事業最高的成果。此會足以反映郭士立牧師「政」「教」之身份，雖則福漢會因那文離港停辦，惟是宣教事業則由三巴傳道會所承繼；甚或一八五四年戴德生牧師 (Rev. Hudson Taylor) 之來華成立內地會；而香港聖公會首任華人教士羅心源更是郭氏之門生，故郭士立牧師創辦的福漢會，影響教會發展是極其深遠的。在政治方面因為福漢會之投入太平天國運動，從事革命建設，對太平天國產生實質的貢獻，在近代史上寫下重要的一頁。

(篇幅所限註釋從略)

(人文及社會科學文庫)

# 戴高樂與現代法國

吳圳義著

廿四開本 平裝四二四頁 定價二一六元

一九八五年，查理·戴高樂創造了法國第五共和。他不但連續主政十年有餘，且對往後的法國內政和外交產生很深遠的影響。

本書以專題研究的方式，試圖了解戴高樂在第五共和時期法國的內政和外交所扮演的角色。在內政方面涉及四個主題：第五共和憲法、法國共產黨、一九六八年五月危機、法國核子武力的發展；在外交方面涉及三個主題：歐洲共同市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及與共產集團外交。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  
郵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電話：三一—一五五三八